

圆明园正觉寺文殊造像历史演变考

A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njusri Statue in Zhengjue Temple
in Yuanming Yuan

张孟增

Zhang Mengzeng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21 Vol.22
故宫学刊
二〇二一年 总第二十二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圆明园正觉寺文殊造像历史演变考

A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njusri Statue in Zhengjue Temple in Yuanming Yuan

张孟增

Zhang Mengzeng

内容提要：

本文以清乾隆朝文殊造像营建为线索，因“就近瞻礼”仿山西五台山殊像寺兴建香山宝相寺，继而在皇家宫苑沿用此例营建文殊青狮像。通过分析文殊像营建历史、比对旧照特征和分析现存建筑，得出圆明园正觉寺文殊像和承德殊像寺文殊像均显示出对五台山文殊像的摹写，正觉寺文殊像与承德殊像寺文殊像非常近似这一结论。

关键词：

圆明园 正觉寺 文殊造像 乾隆 源流

ABSTRACT:

This paper traces the history of constructing Manjusri statues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For the convenience of worshipping, Baoxiang Temple was commissioned at the Fragrant Hill modeling the Shuxiang Temple in Mount Wutai in Shanxi province, and then statues of Manjusri riding a green lion in the established style were mandated in imperial garden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history of Manjusri statues, and the comparison of the features from the old photos and heritage structures, the paper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Manjusri statues in both Zhengjue Temple and Shuxiang Temple in Chengde show imitations of the Manjusri statue in Mount Wutai, and that these two Manjusri statues bear close resemblance to each other as well.

KEYWORDS:

Yuanming Yuan, Zhengjue Temple, Manjusri statue, Qianlong Emperor, origin

作为清朝统治阶级的满族，其先世沿袭女真人的社会习俗信仰萨满教。清入关前，为与明朝争夺蒙古，确立了尊崇黄教的基调。藏传佛教的僧人因戴黄色僧帽，汉语中俗称黄教。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尊崇黄教政策日益明确，康熙朝正式确立“兴黄教安蒙古”的国策，佛事活动也一度在乾隆朝达到鼎盛。尤其是，清乾隆帝对山西五台山文殊道场尊崇有加，他一生中六次朝山，三次尊奉崇庆皇太后瞻礼，又在北京、承德等地仿建了一系列供奉以文殊骑狮为主像的佛教寺庙，圆明园正觉寺就是其中之一。随着历史变迁，圆明园正觉寺文殊亭内的文殊菩萨像亦在后期损毁无存，除金勋先生《成府村志》和刘阳先生的文殊像旧照外，有关正觉寺文殊像的档案文献流失严重。本文旨在通过文献梳理，考证文殊菩萨造像历史演变，以期最大限度还原和展示圆明园正觉寺文殊造像的原貌。

一 圆明园正觉寺历史变迁总述

正觉寺作为圆明园内重要的御用佛寺，建成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占地14300平方米。咸丰十年（1860）年及光绪二十六年（1900）圆明园两次罹劫时，正觉寺因独处绮春园墙外而幸免于难。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觉寺曾被义和团占用。翌年春，德军驻朗润园时，曾拆毁正觉寺大殿的装修及门窗作燃料，还将大量西藏进贡的锦边彩画番佛像挂于朗润园的德国兵营里。民国时期，曾任北洋政府代国务总理的颜惠庆用理藩院的公款将正觉寺购到手，遣散喇嘛，拆去殿内佛像，经装修改造，作为其私人别墅之用。至此，正觉寺内文殊像等佛像已全部损毁无存。

1934年2月，根据南京行政院令，圆明园遗址交给清华大学办农事试验场，正觉寺也被用作清华大学单身教职员宿舍。1971年，清华大学从正觉寺退出，北京长城锅炉厂（原海淀修造厂）搬进正觉寺，大量修造厂房和生活区，乱拆乱建，正觉寺剩余建筑再次遭受破坏。2001年底，正觉寺重新回归圆明园管理处时，寺内仅残存山门、文殊亭、四座配殿及26株古树。2002年底，正觉寺修缮工程正式启动，2011年7月6日，正觉寺以崭新的面貌正式向社会开放。

二 清乾隆朝文殊造像兴盛原因分析

文殊造像活动在清乾隆朝极度兴盛，有以下原因：

（一）延续用黄教怀柔蒙藏的既定国策

藏传佛教作为满、蒙、藏关系的文化纽带由来已久。借助佛教建构起与蒙古诸部的地缘宗教政治联盟，无论是在清朝早期势力扩张阶段，还是入主紫禁城后巩固政权的战略中，都是清廷蒙藏政策中的重要内容。¹尽管清朝皇帝对待佛教的态度各有特点，例如，顺治帝持学佛的态度、康熙帝是尊佛的态度、雍正帝

¹ 周齐：《清代佛教与政治文化》，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页。

是成佛作祖的态度、乾隆帝则是集转轮圣王与王法于一身的态度等，但这一既定国策始终未变。为了彰显自己尊佛信佛的诚心，有些清帝还自称居士，如雍正皇帝自称圆明居士、乾隆帝自称长春居士等，又进一步拉近了清帝与蒙藏的关系。

此外，清帝又在北京香山宝相寺、圆明园正觉寺和承德殊像寺等处仿建了一系列供奉以文殊骑狮为主像的寺院，此类活动名义上是为了祈福延寿，但其深层原因是通过对五台山殊像寺文殊像的系列仿建，建立起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文殊菩萨的联系，乾隆帝将自身塑造成满、汉、蒙、藏共同拥戴的转轮圣王，从而将满、汉、蒙、藏宗教文化融为一体，通过王权辖制教权，维护清朝政权的长治久安，以实现利用佛教巩固清朝大一统政权的目的。

（二）与乾隆帝自身佛教渊源有关

谈到乾隆帝与藏传佛教的渊源，不能不提三世（活佛）章嘉·若必多吉（1717—1786）。三世章嘉自少年时就与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关系密切，在乾隆即位后又作为国师而备受倚重。乾隆十年（1745）还曾跪受三世章嘉灌顶。三世章嘉不仅翻译整理了大量佛教文献，还直接参与了一系列皇家佛寺的营建和造像活动。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等文献记载，自乾隆十五年（1750）开始，三世章嘉先后主导了香山宝谛寺、宝相寺、圆明园正觉寺、颐和园佛香阁、承德普宁寺等一系列寺院的营建¹。另据金勋先生《成府村志》记载，正觉寺最上楼内还专为三世章嘉活佛设有罗汉床一处，专供其休憩。作为乾隆帝的长眠之所，位于河北遵化的裕陵地宫的营建也体现了三世章嘉的重要影响。在三世章嘉主导和参与的佛寺营造中，文殊菩萨普遍受到特别的尊崇。

（三）强化乾隆帝与文殊菩萨对应关系

“文殊”是“文殊师利菩萨”的省略。文殊是“妙”之意，“师利”指“首、德、吉祥”等意思。所以人们也称文殊菩萨为妙首、妙德、妙吉祥菩萨。因为乾隆帝属相为兔，兔子属相的守护神是文殊菩萨，而文殊菩萨又是聪明智慧的化身，因此，乾隆皇帝习惯以文殊菩萨下凡自居，常命宫廷画师在宫廷宗教绘画及唐卡上将文殊菩萨按照自己的肖像来画。在西藏布达拉宫和清宫所藏多幅乾隆帝佛装像唐卡中，以转轮圣王形象出现的乾隆帝，通过梵夹和宝剑，直接体现了乾隆帝与文殊菩萨的对应关系。

三 清乾隆朝文殊造像历史演变考证

目前，能查阅到有关正觉寺文殊像的文献主要是金勋先生的《成府村志》和刘阳先生的正觉寺文殊像半截像旧照，仅凭这些文献难以还原和展示正觉寺文殊像原貌。笔者希望通过考证清乾隆年间文殊造像历史传承演变，以最大限度还原和展示正觉寺文殊像原貌。

¹ 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151、162-163、231页。



图1 山西五台山殊像寺文殊像

（一）中国文殊菩萨道场之五台山

五台山殊像寺，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台怀镇，因大殿内供奉五台山地区最大规模的文殊像而得名。五台山殊像寺建于唐，元延祐年间重建，明弘治年间再建。现存的文殊大殿为明弘治二年（1489）由铁林果禅师主持兴建。殊像寺文殊大殿正中塑有文殊骑狮像一尊，总高9.87米，狮高3.95米，莲座高1.6米。文殊菩萨端坐其上，头戴宝冠，遍身衣饰，手执如意，双目平视，神情庄严慈祥。文殊像两侧后有胁侍菩萨及侍从，背光后为南海观音和善财童子、龙女等。

山西五台山是海内外知名的佛教圣地，被佛教徒视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吸引了无数信众前往瞻仰朝拜。民间有一则关于“五台山荞面头文殊菩萨”传说，相传五台山殊像寺文殊大殿内狮像已塑成，文殊菩萨也仅差头部未塑完，但此时工匠们因不知道文殊菩萨的面容和神态而犯难，甚至争论不休。有一天，正当工匠师揉荞麦面做饭时，天空

中佛光闪现，云端出现文殊菩萨形象，匠师顿悟这是菩萨化现来指导自己，于是急忙用手边做饭的荞麦面按照云端菩萨形象把头像捏了下来，安在已塑好的文殊像身上，不大不小，与身子相称，神态庄严，浑然一体。于是五台山殊像寺文殊像就是这样在“菩萨显灵”的帮助下塑造成的，民间将五台山文殊像与文殊显灵联系起来，这个传说在内蒙古、青海、西藏产生了广泛影响，不仅提升了五台山殊像寺的地位与影响力，也为清乾隆时期的朝觐与后期摹写打下了基础。

（二）乾隆帝亲手绘制文殊像小图

清朝实施以孝治天下，历代皇帝都把孝道放在重要位置，清世祖顺治帝和清世宗雍正帝还对《孝经》做过注释，并颁布天下。清乾隆帝更是对皇太后孝敬有加，多次奉皇太后朝觐五台山，因对五台山文殊造像敬仰不已，亲手绘制文殊像小图，回京后仿五台山殊像寺营建了香山宝相寺。

据乾隆《御制诗集》中作于乾隆四十年（1775）的《殊像寺落成瞻礼即事成什》记载：“殊像寺瞻礼时心识相好，于行营即摹为小图。既归又廓成大图，建宝相寺于香山之南，命工依像装塑，今始落成。”¹

从乾隆御制诗记载可以看出，乾隆帝在瞻礼五台山殊像寺时，得见文殊骑狮圣像〔图1〕，敬仰不已，在行营内描摹小图，回京后重绘大图，并依此建成香山宝相寺。

另据《乾隆帝起居注》记载，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朝台时，二月二十四日乾隆第一次朝觐殊像寺，

1 （清）高宗撰，蒋溥编：《御制诗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二十八日回銮时再次朝觐殊像寺，随后于三月十日到达保阳行宫，乾隆自绘的文殊小稿即于此时完成¹。

（三）丁观鹏奉旨摹写文殊青狮像

中央美院陈捷和吴晓敏在《圆明园正觉寺文殊像复原研究报告》中指出，丁观鹏按照乾隆帝旨意，历时七个月精心绘制文殊骑狮像图甲、乙两幅〔图2、图3〕，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两幅作品均为纸本设色的文殊青狮像，且属“新样文殊”范畴。

甲图题记：“乾隆辛巳春，上以祝厘巡幸五台。瞻礼曼殊宝相，圆光默识，如月印川。回銮后，摹写为图，水墨庄严，妙合清凉真面。复以稿本，命小臣观鹏设色。斋盥含毫，积七阅月。虽华鬘珠珞、狻座莲台，殫竭小乘知解，而于师利本来相好，实未能裨助万一。窃自念凡庸末技，幸得仰承天笔拟绘金容。辟诸匠众为优填王作旃檀像，雕镌涂泽，无足名称，而浊质钝根，获沾香国功德，欢喜信不可思议。臣丁观鹏敬识，臣丁观鹏恭画”。

乙图题记则较为简单：“乾隆二十六年四月，臣丁观鹏奉敕敬绘”。

乾隆帝对丁观鹏绘制的文殊青狮像非常满意，并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撰写《写五台殊像寺文殊像成并赞》诗以记之：“五峰鼎峙，境实清凉。日面月面，灵鹫中央。曰有祇园，巍然前麓。殊像是名，法光赫昱。师子奋迅，大士端严。均佛性智，稽首和南。祝厘葳庆，载经花宫。相好默识，如印印空。像即非像，真岂诚真。本无同异，何复云云。写者为能，应复有所。乖曼殊义，咄哉未可。于未可中，睹此满月。常住庄严，利济无竭……。”²

（四）北京承德地区文殊寺院营建

清乾隆年间，出于就近瞻礼需要，通过对五台山文殊的写仿，在北京和承德皇家御苑内相继营造了以文殊骑狮为主像的香山宝相寺、圆明园正觉寺、承德殊像寺等寺院。

1. 北京香山宝相寺文殊像营建

香山宝相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南麓，建成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寺内主体建筑为旭华之阁，檐下嵌有石刻横额，上书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的“旭华之



图2 丁观鹏绘制文殊像甲



图3 丁观鹏绘制文殊像乙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册，第60—80页。

2 （清）高宗御制：《御制文集：初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阁”，为乾隆御笔，意思是太阳升起，佛光照耀的地方。内立两块石碑，左面镌刻文殊菩萨的画像及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御笔题诗；右面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立的御制宝相寺碑。殿内正中供奉文殊菩萨塑像。宝相寺后毁于八国联军之手，旭华之阁内造像无存，文殊像碑刻亦毁损严重，仅存数块残片。据中央美术学院陈捷先生考证，比对香山宝相寺文殊残碑上文殊像线刻图案与丁氏两图，得出其形象与丁氏乙图十分接近。

香山宝相寺是为皇太后七旬寿诞所营建。据乾隆三十二年（1767）《宝相寺碑文》记载：“岁辛巳，值圣母皇太后七旬大庆，爰奉安舆诣五台，所以祝釐也。殊像寺在山之麓，为瞻礼文殊初地，妙相端严，光耀香界，默识以归。既归则心追手摹，系以赞而勒之碑。香山南麓，曩所规菩萨顶之宝谛寺在焉。乃于寺右度隙地，出内府金钱，飭具庀材，营构兰若，视碑摹而象设之。金色庄严，惟具惟肖……。”¹

《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则更加详细：“宝相寺，乾隆二十七年建。先是岁在辛巳，驾幸五台。回銮后御写殊相寺之文殊像而系以赞，并命于宝谛寺旁建兹寺，肖像其中。殿制外方内圆，皆髹髹而成，不施木植。四面设瓮门，殿前恭悬皇上御书，额曰：旭华之阁。殿内碑二，左碑恭镌御写文殊像并赞，碑阴恭勒乾隆三十二年御制诗。右为乾隆二十七年御制宝相寺碑文。”

又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宝相寺在宝谛寺南，乾隆二十六年皇上巡幸五台，皇太后祝釐，因于殊像寺识其相好，回銮后摹写成图，系赞勒石，二十七年命构兹寺，肖像其中，御制碑文以记。”

通观上述资料可知，香山宝相寺是为庆贺皇太后七旬寿诞仿五台山殊像寺而建。为了就近瞻礼，供奉文殊菩萨的做法以香山宝相寺为起点，也促成了后期圆明园正觉寺与承德殊像寺的产生。

2. 圆明园正觉寺文殊亭文殊像营建

圆明园正觉寺建成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圆明园遭劫后，正觉寺内文殊像亦损毁无存。关于正觉寺文殊亭内造像年代及其摹写关系的资料目前暂付阙如。正觉寺文殊像虽已无存，但清末金勋先生的《成府村志》中对文殊亭及文殊像尚留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再北为双檐八角亭，曰文殊阁。亭内神台高六尺，南北长方形，以汉白玉刻成须弥座儿。台上塑一青狮站立，昂首南向，项上红色嵌珠玑，悬着五个金铃，正中红色西牛尾居胸。腰部披锦绣，左右双垂瓔珞垂珠金穗子。狮尾部上卷。狮高八尺，身长一丈四尺，周身贴赤金数层，然后在金上刷石青，用竹签拨石青即露出线纹。宜次拨之，成为蓝狮，周身金毛。此种做法名上五彩，俗称拨金活。狮背上驮一九品莲台，上坐一楠木雕刻文殊菩萨，右腿盘座，左腿伸下莲台，复由莲台下部上升一枝莲花托着左足。双手在胸前，右手掌向上，左手掌平伸如接礼状态。项下左右披肩，赤背披瓔珞垂珠，额带扇云烈焰金冠，身后背光高丈余，光焰中雕刻西番莲十二朵，上部佛像及背光均用赤金包裹，罩退光漆。该像通高三丈。神台上塑站童。东为狮奴，黑面虬髯，面目丑恶，带五色条儿螺蛳盔，其服装若西洋‘回回’。右手牵狮，项上缰绳。狮之右塑一韦陀，全身甲冑，五彩装金，风带飘扬，威风凛凛。左手捧降魔杵，手掌在胸部向上伸，如还礼状。”²

此外，有刘阳先生收藏的民国时期正觉寺文殊像旧照〔图4〕问世，但仅摄入文殊菩萨下半身及青狮

1 香山公园管理处编：《清·乾隆皇帝咏香山静宜园御制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第517页。

2 金勋：《成府村志》，第615页。

等，殊为可惜，但依旧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3. 承德殊像寺宝相阁文殊像营建

承德殊像寺，位于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之北，建成于乾隆四十年（1775），仿香山宝相寺而建，形制以汉族庙宇建筑为主。

据乾隆《御制诗集》中作于乾隆四十年（1775）的《殊像寺落成瞻礼即事成什》载有：“兹于山庄普陀宗乘庙西营构兰若，庄校金容一如香山之制，而堂殿楼阁略仿台山，亦名以殊像，从其朔也……工始于乾隆甲午夏（1774），逾年落成。”

从《殊像寺落成瞻礼即事成什》记载中可以看出，承德殊像寺的文殊造像直接仿自香山宝相寺文殊造像，寺名仿用五台山殊像寺。



图4 圆明园正觉寺文殊像旧照（刘阳提供）

四 圆明园正觉寺与承德殊像寺文殊像相关性分析

（一）文殊像营造时间分析

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始，至乾隆四十年（1775），在此五年中，适逢乾隆帝六十寿诞，同时又是崇庆皇太后八十寿诞，以祈福祝寿为核心，乾隆帝在北京与承德进行了多项文殊像营建工程。依据丁观鹏绘制的文殊像，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建成香山宝相寺，乾隆三十八年（1773）建成圆明园正觉寺，仿香山宝相寺于乾隆四十年（1775）建成承德殊像寺。这一系列寺院均以源自五台山文殊菩萨为供奉重点，从而形成了一个由五台山殊像寺至承德殊像寺文殊造像的传播历程。而圆明园正觉寺与承德殊像寺建成时间仅相差不足两年，二寺文殊造像营造时间接近。

（二）文殊像旧照特征分析

对比正觉寺文殊像与承德殊像寺文殊旧照〔图5、图6〕，可见二者非常接近。

其一，文殊的青狮和胁侍高度相似。从上述金勋《成府村志》中关于正觉寺文殊亭文献记载，两寺旧照所记录的青狮无论姿态抑或饰物，均颇为一致。按照中央美院陈捷教授和吴晓敏教授在《圆明园正觉寺文殊像复原研究报告》中分析，正觉寺文殊像旧照中青狮头颈部较为纤细，接近五台山殊像寺青狮，不似承德殊像寺青狮粗壮。至于两侧胁侍，文献和两寺旧照亦基本相符。主尊左侧狮奴（即于闐王）为少数民族形象，在旧照中虽然右手缺失，但仍能看出握持缰绳的姿态。狮奴头戴角状软帽，上施彩色条纹，即所谓“五色条儿螺蛳盔”。主尊右侧并非五台山殊像寺之善财童子，而换为韦陀。此处韦陀全身甲冑，左手当胸“如还礼状”，右手持金刚杵。

其二，两座亭阁内造像内容一致，均为主尊文殊及狮奴、韦陀。



图5 承德殊像寺文殊像旧照



图6 承德殊像寺文殊像旧照

其三，青狮的造像风格与式样相近。对比承德殊像寺和正觉寺旧照，按照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院长在《圆明园正觉寺文殊像复原设计研究报告》中所述，两者狮子的造像风格一致，样式几乎相同，只不过在胡须、肌肉等造像细节上略有微小的差异。因两座寺庙几乎同时建成，结合造像的建造流程来看，两者极有可能使用了相同的图样或蜡样，只是工匠在雕刻时略有出入。

（三）文殊亭现存建筑分析

其一，圆明园正觉寺与承德殊像寺供奉文殊造像建筑的形制相似，两者均为重檐八角亭，内部均供骑狮文殊像，仅承德殊像寺宝相阁尺寸稍大。

其二，二寺均由满族僧人住持，据金勋《成府村志》所载，圆明园正觉寺、万寿山功德寺、香山宝谛寺三处均为北京地区最重要的、由满族僧人住持的御用庙宇。承德殊像寺作为隶属于避暑山庄的御用佛寺，同样由满族僧人住持，且与正觉寺一样，均在正殿内储有罕见的满文大藏经。但二寺在形制、体量与供奉内容上略有不同，这也反映了二者定位上的差异，如承德殊像寺体量略大，与其身处旷野、周边又有普陀宗乘庙等大型建筑群有关；正觉寺体量较小且精致，则与圆明园景观更协调一些。

五 结 论

出于团结蒙藏和就近瞻礼的目的，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崇庆皇太后七十寿辰之际，乾隆帝陪皇太后到五台山殊像寺礼佛，因文殊像深为太后喜爱，乾隆帝亲绘文殊像小图，到丁观鹏奉旨摹写文殊画像，从而在北京和承德等地开启了一系列仿建供奉以文殊骑狮为主像的佛教寺庙营建活动，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仿五台山殊像寺而营建香山宝相寺、乾隆三十八（1773）建成的圆明园正觉寺、乾隆四十年（1775）仿建香山宝相寺而建成的承德殊像寺等。结合乾隆年间文殊造像兴盛原因、仿建演变，以及圆明园正觉寺与承德殊像寺营建时间比较接近，二寺现存文殊像旧照特征和文殊阁遗存建筑均表现出高度相似，与香山殊像寺文殊像一样具有同源关系，从而可初步推断出，圆明园正觉寺文殊造像与承德殊像寺文殊造像非常近似，均仿建香山宝相寺文殊像这一结论。

[作者单位：圆明园研究院]



